

Life Inc.

公司化的生活

给在企业纽带另一端真实生活的人们

[美]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著 余巍◎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Life
Inc.

公司化的生活

给在企业纽带另一端真实生活的人们

[美]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著 余巍◎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司化的生活 / (美) 洛西科夫著, 余巍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9

书名原文: Life Incorporated

ISBN 978-7-5086-3485-2

I. 公… II. ①洛… ②余…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8474 号

Life Incorporated by Douglas Rushkoff

Copyright © 2009 by Douglas Rushkoff.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公司化的生活

著 者: [美]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

译 者: 余 巍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1-392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485-2 / F · 2706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Life
Inc.

前言

要钱还是要命——在自家门前得到的教训

我在圣诞节不幸遭劫。

当我把垃圾拿到我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楼门口准备倒掉的时候，一个人用枪顶着我，叫我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我把手上的现金、钱包和手机都交给了他，但当时我又突然想起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的有关谈判高手的场景。于是，我求那个人允许我保留我的医保卡。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让自己的看起来更人性化些，他就不大可能会杀掉我。

我解释道，如果没有这张卡，要获得什么医治都将异常困难。他接受了我的请求，并把卡还给了我。接下来，我们达成了协议：尽管我看清了他的样貌，但我承诺不会报案以回报他的“恩惠”。之后，他便沿着街道逃得无影无踪。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一直傻傻地却也牢牢地守住了这份协议，不论有多难熬。那样子就好像我在枪口威胁下，签下了一份具备约束力的合同一样。

与此同时，我把这段奇特而恐怖的经历写成帖子发上了“公园坡家长”网站。这是个相对开明的网络社区，用户包括一些母亲、健康食物分享和互助会成员，以及其他致力于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和所属社区成熟的左派

人士。我感觉有责任发这个帖子，同时也期待获得一些同情和支持。

出人意料的是，我收到的头两封信来自两个愤怒的人，他们怨我不该把发生犯罪行为的街道名称公布在网上，并且质问，难道我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信息公开会给我们小区整体的房屋价值带来负面影响吗？本来卖方市场就已经足够困难了！当有报道称某个著名演员要从这个片区搬到曼哈顿后，布鲁克林的房地产市场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负面曝光吗？这件事发生在房地产崩溃之前。

当时我就目瞪口呆：人们难道更关心他们自己社区的房产价值，反而不那么关心在社区里真正发生的事情吗？更何况，掩盖问题也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长远来看，只有开诚布公地讨论犯罪以及如何去预防它，才能促进社区安全。最终，房价总会不降反升的。所以说，和房产的远期资产价值比起来，这些房东更关心他们自家房产的即时变现能力，而不是他们实际的居住体验和过程。这些都来自全纽约最富有的人群，是不应该对此过于担心的。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行为？

这给我泼了盆冷水，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评估我 10 年来的夙愿：由租户升格为房东。我停下来开始思考，在今天房地产市场一片非理性的狂热中，这有可能是不太明智的做法。在我的博客里，我表达了这样的疑惑：如果同样都容易遭到打劫，那我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租一个便宜得多的住处，而非要在据说是布鲁克林最潮的片区每月花 4 500 美元租这个只有两个卧室，位于四楼又不带电梯的公寓呢？难道我情愿被卷入这个失控的市场吗？

接待我报案的警官们为我进行了透彻分析，其中一位找了张布鲁克林区地图，在上面画了个圈，说：“在这个圆圈里面居住的是正从曼哈顿搬来的富有白人。这就是目标区域，是狩猎场。从你遇到的那个劫匪的角度来看：这里安静，林荫道两边都是一栋栋价值上百万的房屋，那些富人住在里面，而他们却迫使你和家人离开家园。现在，你就住在这个圆圈周边的

社区，如果你是歹徒，你又会选择去哪里打劫？”

回到网络上，同样来自公园坡的一位作家朋友作出了公开的声援，支持我们一家继续在布鲁克林居住。他把这块“坡地”看成一个多用途社区，说它实现了一种超高的宜居水平，正如传奇的城市人类学家简·雅各布斯所设想的那样。他曾解释过，所有知名的相邻社区都会历经同一个基本的发展过程：一些艺术家首先搬到他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地方，那里贫穷且一无是处。渐渐地，他们其中足够多的人开起画廊，人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来到画廊，对周围咖啡馆或者其他设施产生了附带需求。慢慢地，肯定会出现一两个艺术品商店，还有一帮潮流人士，率先让社区内的街边活动活跃起来直到深夜，使得这个社区对接踵而来的商业活动和居民来说，更有保障。

当然，一旦都市报“发掘”出这个新潮社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最初那批艺术家的行列，成为后起之秀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大多会是富裕且没那么赶时髦的年轻新贵，包括专家、律师和商务人士——但愿这样的新贵也别太多，以免这个区域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味道”。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投资，这个社区会越来越大，里面的每个人都会更愉快、更富有。

只不过，就像之前那位探长所提到的，那些最早居住在那里的人——也就是那些“原住民”，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些什么呢？这种把下层住宅高档化的行为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的事情。相反，当房价上涨，租金也会跟着上涨，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调整他们的月度生活开销，任何人都会被取而代之。这个小区的居民其实根本没有参与到高档化的复兴过程，因为他们不是房屋的主人。他们不得不搬到外围地区。当然，他们的孩子依然到公园坡中心的约翰·杰伊高中去上学，可是，那些住在公园坡的富裕房东没有一个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读书。

我们在网上的讨论内容被《纽约周刊》收入一个栏目当中，栏目名叫：“作家们正在逃离布鲁克林吗？”栏目文章从头至尾都在关注：针对一位作

家的犯罪如何能威胁到布鲁克林的房地产泡沫。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通过电话采访了我——不是关于被劫本身的经历，而是关于我是否会因此离开布鲁克林，以及如果我公开这样做了，是否有可能不至于不负责任地损害到其他人的房产价值。接下来一两周，网上都沸沸扬扬，而《纽约周刊》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质问我究竟为什么要在意作家们是否要离开布鲁克林——而似乎很明显的是，正是同一个栏目之前从一开始就教我们要在乎。

那段15分钟的采访非常有趣。当时发生的一切和犯罪或作家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关系到一个即将走向末路的沸腾的市场。我只是无法承受买进房产的负担——而此次遭劫也把我从极其枯燥无味的生活中抽离出来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让我足以面对现实。或者，更准确地说，与其说我不能负担，还不如说我不愿负担。有些按揭贷款经纪人愿意向我提供90%的房贷，使我在租住的街区买上一套房子。他们会说“我们可以为你排除万难”，而处在房地产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时刻，即使我只能支付10个百分点，我也足以成为一个优质的买家。我记得我问过：“如果按揭贷款重新调整怎么办？”他们向我保证道：“那时你可以用一个更优惠的利率取得二次贷款。”当然，这些可能就发生在公园坡小区被人为降低的房产税（地产开发商所提供的免税优惠）重新被抬高到本市某些贫困地区的税率水平。某个房产经纪人朝我使了个眼色，解释道：“别担心，每个和你财力相当的人都在这么干。而且现在，银行也不会让所有人都失去他们的家园吧，不是吗？”

只要大家拒绝看清真实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市场就可以一直上涨——一部分是由投行从业人员所获得的高额奖金所刺激的，而这些人职责从一开始就是要推高整个资产通胀。真见鬼，我们正把一个市区重新拉回到历史的荣耀当中。我们只需要回避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我们正忙着把由贫穷的黑人和拉丁裔族群混居的公寓重新变回供富有白人居住使用的豪华别墅；同时，我们还要尽量忽视另一个事实：这股房地产交易的狂潮是基于向未来借时间，更重要的，是向未来借钱花。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任何让大众关注这些真相的做法都是犯罪，而投身于投机泡沫的人们都有理由作出第一反应，压制出头人的言论。在商言商。现实当中，我们把一群敌意日渐加重的人群赶离他们的家园，抢占他们的社区，之后又将这种占有合理化，并用更活跃的经营活动、报道里降低的犯罪率，加上最重要的一点——更高的房价来加以粉饰。这让人如何去反对别人如此“美化”一个社区呢？

我的作家朋友在他的博客里辩解说，以大多数标准来看，这个社区都比以前更安全了。在一个惬意的夏夜，和孩子们一起坐在门廊里吃意大利冷饮，现在又成为了可能。人们在任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走过展望公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这里有黑人家庭在野餐，那边还有一群波多黎各人，另外还有一群爱尔兰裔的朋友。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相比，这已经足够文明了吧，不是吗？

这可能听起来很浪漫，可这根本不叫融合，而只是同地共存，未来之城“爱普考特”（Epcot）式的关系缓和。这里所描述的布鲁克林基本上可以说和我们祖辈生活过的那个布鲁克林没有什么关系。它倒更像是“褐沙石布鲁克林”概念的一个昂贵而又困难的翻版，而真正的“褐沙石布鲁克林”却从来没有存在过。如果人们曾经在夏夜里坐在门廊吃冰品，那只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那时还没有空调和电视。大家有的是时间闲坐在外面，所以大家就这么做了。这个社区的街坊邻居们在这样一个公园里完成了多文化相互融合的幻象，实际上只不过表示他们愿意坐在彼此旁边野餐——而不是共同进餐。他们都会回到位于市区不同角落的各自的家里。我那位作家朋友的孩子们第二天一早还是会去他们的私立学校，其他的孩子们还是去公立学校。他们根本不算是邻居。

此外，公园坡里一排排的褐沙石房屋并不真的是用褐石砌成的，它们是由一种类似于墙面灰泥的材料覆盖住的，厚厚的一层涂料其实是用来制造褐石块交错层叠的假象。门面就是门面。任何一栋褐沙石房屋的房东不

用多久就能发现，藏在底下的煤渣块很快就会暴露出来，使他们不得不花费不菲的“翻新费”来把它们重新掩盖起来。同样，财富、媒体和衡量标准也只能暂时使殖民者与他们的真正处境隔绝。最后，那些用上千美金的婴儿车推着孩子到处转的家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已经被某些动辄几十亿的产业所塑造，这些产业都致力于打造培育下一代的潮流，这些家长到头来却屡遭这些“工程项目”造就的孩子投掷石块。（尽管放心，那个把这反复发生在布鲁克林一个和谐广场上的场景写过新闻的人在网上也遭到了应得的嘲笑。）

当一场野火或一只土狼突然打乱了加利福尼亚人想象中到郊外享受的“自然”生活，他们会感到惊讶，和他们一样，就在我们十分明确地以自身扩张的社会成本为代价，自冒风险去“开发”、“殖民”并且“融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过来咬我们的屁股——或者在门廊前打劫我们，我们也会感到意外。我们很容易去责怪大型机构和社会趋势把我们带进了沟里，但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不管受到多少影响——才是我们自身遭遇不幸的根本症结所在。

布鲁克林的公园坡只是一个缩影，让我们很多人看清自己如今正一步步自甘堕落的真正情形。我们生活的世界倾向于某种模式的行为和某种选择思路，而这些都是有违于我们的最后判断，同时也有悖于我们自身的整体利益。我们没有选择相互协作以保障我们所有人的最佳前途，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现在只追求短期利益，全为看上去固定的资源，我们也因此相互竞争得愈加激烈。简而言之，与其说我们以自然人的身份在行动，不如说我们正像公司一样在运作自己——当面对本地的一起抢劫事件的时候，公园坡社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的品牌。

金融危机可能不是对我们所犯过错的惩罚，在我们无度地迷恋经济价值胜过其他任何价值之后，产生了一些后果。我们把自己同真正重要的东西割裂开来，进而依赖某种商业体系而成长，但是这种体系生来就不是把

我们当人来服务的。一旦我们接纳了这种投机性抽象经济模式中的道德观，在面对与其并行的实体经济的崩塌时，我们本来拥有可以发现并扭转局面的机制，也就此被抹杀掉了。

尽管在当下这场由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所部分导致的金融乱局中，我们正在努力挣脱出来，但仍然在以企业体系、中央银行，以及短视的衡量标准来丈量我们回复健康状态的进程。这就好像我们相信终归会找到的答案，就在有线电视某个财经频道讨论的贸易潮流和未来大势里面，而不在外面的现实世界中。对于社区和个人生活品质的有机结合，我们真正的投入退居其次，在报纸上所谓的“房地产板块”寻找和自家房产类似房源的价格成为更关键的事情。我们关注道琼斯指数，把它当作我们社会机体唯一的真实生命体征，而我们手头货币的汇率就被拿来衡量国家财富或者个人价值。

而这些又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现实世界的观念和活动离我们更远，本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进行真正的再创造，来获得某些价值。我们没有选择解决这个问题，进而重新收回我们直接创造财富的能力，而是寻求依靠一些机构，而它们向来都是以夺取我们的这种创造能力为根本目的的。正是这些机构破坏了我们的经济，而我们却尝试通过强化它们来修复我们的经济。在经济鼎盛时期，公司社团主义有效地将外围世界的财富榨取出来，并输送到核心，这个过程就是把人民群众的财富聚集到企业社团寡头手上。现在，虽然繁荣昌盛的源泉已经枯竭，我们仍继续向地下深处挖掘，去探寻资源来维持这个邪恶系统的运转。

所以当我们的公司渐渐衰退并削减工作机会的时候，我们却为了保住未来的工作而主动帮助它们脱离困境，即使深知它们的商业模式将不可持续。银行的信贷计划崩溃的时候，我们授权我们的财政部为银行印刷更多的钞票，而由我们以及我们的子辈来承担所有的代价。然后我们从它们那里把这些钱借回来的时候却要付出利息。对此，我们一清二楚，却别无他

法。我们已经把自己的积蓄和投资外包给华尔街太久了，以至于对如何在真枪实弹的现实世界中投资已经毫无头绪。我们在意公司所面对的困难，远胜于关注有血有肉的人类所处的困境。我们争取以榜样和救世主的姿态参与到公司活动中，而在与同事的互动中，却成为一个待宰羔羊一般的竞争者，或者成为被利用的资源。

确实，现在暂时搁置的布鲁克林区优化进程，曾经和殖民开发何其相似。当然，相比较而言，这整个进程进行得要更加谨慎，更加具备技巧。倡导市区贵族化的人回避对他们的行为作出清晰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解读，但无论如何都证明了殖民者潜在的计划：如今是一群潮人、企业家、房地产投机商在征服一片不良社区，而不是一些“特许公司”在开拓和夺取世界上一片未知的地区。当地经济——至少以生产总值的标准来衡量——繁荣起来，但是当地人却沦为新移民的雇员（水果店收银员和保姆）。

就像殖民帝国的扩张一样，对房产的追逐因为进步的开拓精神和个人自由的鼓动而得以持续。房屋产权的意识正是“二战”后的公关策略所造就的。企业和政府领导层认为，和租房族比起来，购房者和扩张经济的利益关系更紧密，他们会更加拥护自由市场的价值体系。但是，这从机能上导致了这样一个自我永续的循环：富裕的白人越是退回到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地界，他们撤出的地区就会越贫穷，这样他们就越感觉他们的离开是正当的。如果说早先第一波真正的“白种航班”是从城市撤退到郊外的话，那么最近的悄然动向，则是从郊区重新搬回昂贵的城市。

诚然，这些中上层移民本身就是信贷行业的目标，行业中高明的借贷工具与世界银行政策的剥削潜能不相上下。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都附带“开放市场”条款，根本上使借贷国家及其资源都屈从于各大远洋公司的操纵。同样，那些贷款经纪人会友善地提供借贷方案，帮助人们搬进新家，然后当利率飙升超过上限的时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消失之前，他们已经把贷款人身上膨胀的还贷义务打包，廉价出售给了出价最高的买家。

社会效益干脆就是水中月、镜中花。无论是布鲁克林人使人相信他们正在促进多元文化融合，还是企业要将自由市场的利益扩张到世界每个角落，二者都无法实现财富扩张的更广泛参与——尽管两种活动都是按期望在运作。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相反，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投机只能加剧财富的分化。富裕家庭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使得公立学校衰落下去；同时，富裕的国家把环境废料都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更有甚者，从一开始就直接将他们的工厂开在了那里——而在自己的国家继续保有良好的环保形象，就像阿斯特罗·特夫（Astro Turf）人造草皮一样绿色无害。

我尊重的那些人，包括我的导师和教授，都告诉我这就是现实的模样。这是成年人的真实世界——我们势必记得，历史上曾经有过比邻部落互相杀戮的日子，敌人用大棒杀掉你们的族人，掳走你们的女人，而到今天，这世界并没有太多改变。要感谢我们已经学会的斯文，低下头，试着不要去想太多。那些循环是经济体与生俱来的本质，市场最终会恢复过来，一切又回到正常轨道——如果你环顾四周，看看其他人的生活状况，你会发现，其实，正常也没什么不好。你也完全不用为此感到愧疚——毕竟，谷歌正在做一些善事，比尔·盖茨也正在向非洲的孩子广拨善款。

但是，不管怎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还不够。我们很快就将遵从于某种社会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之下，作为国家，作为组织，作为个人，我们会做出毁坏自身和他人福祉的行为，而违背股东利益的违规行为到头来将成为唯一值得惩罚的罪行。犯罪心理现在被用于因为任何原因而违犯法律的人，但是金钱原因除外。现实中充斥着自私自利，而不正当暴富的有钱人，则成了我们新一代的英雄，因为似乎只有他们才能够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行为。

每天，我们竭尽所能越过难关。只是，我们仍无法达到预期，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并且任由环境压迫。

珍妮弗在明尼苏达州中部的某个镇上住了一辈子。今年，她被确诊患

上一种狼疮，她开始从沃尔玛购买药品，而不再从本地的药剂师马库斯那里买药——她正好住在这位药剂师的隔壁。她的医疗保险不包括处方药，所以这种改变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为什么药剂师不能给他的邻居打个折扣？他尽力了，但是除去实际成本，他现在只能赚取一点儿毛利。他刚刚申请到一份商业贷款，用来支付成本开销和房租费用。他所在的城市商业区已经被列入再开发计划，这样看起来，只有大型企业连锁机构有足够多的流动资金来支付店面租金。当初马库斯在公开听证会上支持这个计划时，听起来还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地产开发商准备好的宣传册上描述的（里面包含一整套方法教你如何同像沃尔玛一样的“大块头”店铺更有效地竞争）却和现实大相径庭。

马库斯的房东对此实际上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为了使店面更符合新商业区的建筑风格，他不得不花重金重新装修，还必须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商业租户。房东也申请了按揭贷款，需要在几个月内偿清。如果他不提高租金，就无法按时付清贷款。

珍妮弗不再去家长教师联谊会，因为她羞于和马库斯再见面。随着两人交情逐渐变淡，她因为亲手逼他破产而产生的愧疚感也日渐消退。

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的新泽西，卡拉（Carla）是在美国三大医疗保险机构之一工作的一名电话专员，每天都和像珍妮弗一样的人们通话。卡拉有份基本工资，每月还有绩效奖金，根据她所能成功“劝退”而不用支付赔偿的索赔申请数量来计算。除去欺诈的手段，基本上卡拉应该提高所有申请登记成功的门槛，以减少虚假申请。当卡拉毫不避讳地问她的上司是否需要误导客户的时候，她发现这正是上司所解释的要求。卡拉对此感觉不好，但是，她现在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她丈夫因为新房市场的萧条已经失去了大笔承包业务。最终，她还是坚持拒绝欺骗。明知整天都在劝说客户为实际上已包含在保单内的服务埋单，卡拉在晚上要如何入眠？看完一

则电视广告之后，她决定把普通安眠药安必恩换成新型安眠药片鲁尼斯塔。

为上述电视广告工作的一名员工正是我的一位老同事汤姆，他最后找到了这样一份专事医疗保健广告的工作，因为20世纪90年代环保领域的人才还无人问津。此外，他还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至少药品广告使消费者对自己的身体保健拥有主动权。”他对于在电视上推广药品也感到很纠结，因为他相当清楚，这类广告只不过鼓励病患给医生施压，让他们违背自己的最佳判断开出处方。汤姆还是会为工作中的妥协作出补偿，坚定拥护家庭生活里的美好价值。他回收利用纸张、玻璃和金属，带他的孩子们去看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甚至在后院堆个肥堆来处理生活垃圾。但是在去年，他终于坚持不住，买了一辆越野车。为什么？“高速公路上每个人都在开越野车，”他解释说，“这是场汽车装备的竞赛。”如果他继续待在自己的文明世界里，会使全家人都面临风险。“你见过那些人是怎么开车的吗？我为家人担惊受怕呀。”为了赎罪，至少在油价上涨之前，他开始坚持购买一些“碳补偿”——即向环保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以补偿自己超量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有另一个类似的平衡行动，一位来自曼哈顿的家长自我标榜“考虑周到”，拒绝让她的儿子接种儿童疾病疫苗，避免其中的风险。“我们还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她说，“而且如果其他所有小孩都接种了疫苗，我儿子无论如何也接触不到那些疾病了。”她认为，入学儿童被要求接种这些疫苗事实上是为了消除流行性疾病；这更多的是为“群体”的健康考虑，而很少是为了任何个体的孩子。她同时也相信，强制疫苗是医药行业游说的结果，而并不是来自严谨的医学研究。为了达到国家规定“哲学豁免条例”的要求，她从她的拉比（译者注：犹太教教士）那里求得了一封信。与此同时，以某种未知的交换条件，她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以教士的名义安装了一条电话线；教士利用电话账单作为居住记录凭证，把他的儿子们送进了她所在高档社区的重点公立小学，而不用去自己所住社区里那

所 90% 都是少数族裔的学校。至少，他可以宣布成功把孩子留在了“公共系统”之内。

我大学里的一个朋友，现在是英国布莱顿某公立学校的行政人员，因为没有能力做出这种挑战司法灰色地带的事情，才刚刚作了他所谓的“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准备把自己的孩子们全送到私立天主教走读学校去读书。他其实并不特别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天主教的灌输，但除了腐败的政府公立学校之外这是他能够负担得起的唯一选择。他知道，他从公共教育系统里面退出只不过使整个系统少了 3 名“好孩子”和一位潜在的积极家长，他只是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们成为自己美好初衷的牺牲品。

所以，这个例子不只是关于过度贵族化的布鲁克林人如何屈从于市场心理，它更体现出所有阶层都作出了有违自己本心的选择，因为他们相信，这真的就是当时当地所能作出的唯一明智的抉择。仿佛整个世界已经受到冲击，迫使我们倾向于更多以企业股东的方式作出自私自利的、短视的决定，而很少顾及其他的社会成员。我们用这种方式作出的决定越多，我们实际上就越在为这个极其衰落的世界添砖加瓦。在去人性化和自我否定的循环中，我们作出太多不情愿的选择——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宁愿反悔。

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这些选择在现实世界中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它们是人为世界里的虚假选择，这里，我们被迫作出选择，就像一个遭到抢劫的人一样。不一样的只是，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选择都产生于精心打造的压力之下。我们承认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就是商业游戏的代价。

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这样的公理所主宰？

毋庸置疑，但又似乎无可名状，现在我们生存的世界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市场及其逻辑逐渐渗透。从勃起到怀孕，从入学申请到寻找配偶，在家庭和社区无法满足我们的方方面面，都充斥了各种产品和服务。广告都求我们多为自己着想，只不过实现这一目标要我们选择一个公司帮我们行使所有的自主权。

有时觉得就像房间里缺少足够的空气一样，仿佛有一整套的企业日程表在支配所有的人类活动。随时观察，一场晚餐派对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股票推荐会、社交联谊活动或者即兴讨论会——什么都有可能。这才是邀请我出席的真实目的？通过商业赞助的口碑营销，我们个人的社会关系成为推广机会，借助这样的机会，商业品牌努力把自己打造为时尚信仰，而宗教派别则尽力把自己打造成品牌。

一切并不简单，不仅仅是在城镇的主干道开上第二家星巴克，也不仅仅是在公共校车上的紧急广播里新增播放麦当劳广告。每年的圣诞季广告提早多久开始，多少人在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大减价活动上遭到踩踏，新闻报道把经济不振的命运都怪到消费者疲软的节日消费上，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完全无法分辨广告和真实情况的区别，好像二者天然如此。幻想与现实，朋友和营销商，社区和购物中心，它们之间的界线已经被模糊了。那到底是新闻报道、电视真人秀，还是赞助片？

不管我们有多不喜欢便利店和超级市场，这种对真实生活和商业成分的彻底模糊，不只是个审美问题，它更是感到有些地方出岔子的焦虑感——比信贷危机和后危机创伤更大错特错的地方，但我们因过度沉溺于它的影响而对此无能为力，甚至已经对它熟视无睹。整套系统没有人喜欢，也没有人记得曾经如此要求过，但我们就是被它牢牢控制，无人能逃脱。事已至此。当它在我们周围仍将垮塌的时候，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支撑它，没有能力再设想别的替代方案。从我们看起来仿佛可以认清我们自身遭遇或其来龙去脉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洞察力便开始消失，眼前来自各种人和事的迫切需求将把它淹没。他们刚提到什么？那对我的退休金意味着什么？稍等——我的手机在震动。

现在给我们提供食物的那条密不透风的美食街，究竟是否能够从内部看清它？也许被看到的不是全部——但我们可以记载下它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剖析其产生的影响并予以理解。就像我们曾经从臣民成长为公民一样，

我们现正从公民转变为消费者。我们的社区弱化成利益团体，我们的公司和他们的公关公司为我们造就的利己目标，取代了残存的公民参与意识或邻里关怀。我们为了消费者选择的神话，或者更悲哀一点儿，是为了对股东权利的迷信而放弃了真正的参与。

所以，虽然看起来公司企业已经征服了我们的文明，但卫道士对它们的痛斥已经形成时尚，有利于感情宣泄，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效的。新上市的书籍和纪录片里所述的公司罪行让我们顿感心痛，也让我们明白公司制本身是个反社会的实体，它的创建就是为了用尽一切手段聚敛并增加财富。一个公司不用讲什么伦理道德，只关心对公共关系和品牌形象的潜在影响。事实上，拥护环保、支持劳工和左派的许多人都愿意指出，如果公司放弃承担对股价的基本受信责任而采取任何行动，其管理层就应该被起诉，不管这些行动有多道德。

随着公司企业对我们经济、政府和文化的掌控达到空前的水平，我们现在对个人和集体的发展方向感到无助并就此责怪它们，就再自然不过了。然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各大公司或是其中掌舵的商业强盗们都是太过简单和徒劳的事情——且不说那些商业版封面上已经伏法的总裁们。更别提贷款经纪人、信用卡经理或者美联储。当前形势并不是在玻璃建筑顶端的那些银行家和企业家组成的精英群体全盘策划的，不管每个人都多么希望如此——包括他们自己也这样想。当公司的成长和公司活动的优势允许它们渗透我们意识和行为的几乎各个方面时，这些公司实体便不再是唯一要对我们所陷困境负责的人。

更确切地说，是企业社团主义本身：这样一种逻辑，我们已经把它植入了我们体内；这样一种镜头，我们通过它来观察周围的世界；这样一种道德观，我们依照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更糟糕的是，我们接受了这种支配为既定事实，将它作为人类生存状况的既定环境。事已至此。

但，这不是事实。